

试论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

陈炳辉

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的思想对“欧洲共产主义”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重大的影响。葛兰西的思想十分丰富,涉及的领域包括了哲学、历史、文化、教育、政治等众多的方面,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政治的理论。领导权的思想是葛兰西的整个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葛兰西认为政治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第一个要素在于确实存在着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以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政治的全部艺术和整个政治学都建立在这个原始的事实上”。(《狱中札记》第117页)从这一事实的存在出发,就必须考察一下,怎样才可以实现最有效的领导,怎样可以最好地培养领导者,怎样可以找到被领导者或被治理者服从的最合理的道路。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看法,领导权的问题成为葛兰西关注的一个核心。本文试就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国家和领导权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政治压迫的暴力机器,国家的政治统治是建立在暴力强制的基础上的。葛兰西通过领导权的理论,说明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仅是建

联,实际上都是这个家国合一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的传统,这就是我们数千年来置身其中的文化格局。它们从根本上决定着我们的文化的基本性格,左右着我们民族及其各项政制安排的命运。

注 释

①②③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4页,23页,110—132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26页,11页,54页,18页,110页,303页,306页。

⑪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373—374页。

⑫ 梅 因:《古代法》第95页。

⑬ 杨向奎: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序言。

⑭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5页。

⑮ 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

⑯ 转引自《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47页。

⑰⑱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82页,92页,13页。

⑳ 《礼记·祭统》。

㉑ 《春秋繁露·服制》。

㉒ 《新书·服疑》。

㉓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第142页。

㉔㉕李允姝《华夏意匠》第377页,378。

㉖ 《李约瑟文集》第61页。

立在暴力强制的基础上,它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一种人民的自发同意的基础上。在葛兰西的著作中,领导权的概念通常具有两种涵义,广义上的领导权,包括了政治统治权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说:“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狱中札记》第316页)但是葛兰西更多地是在狭义上使用领导权这个概念的,它专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行使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包括文化、精神、道德等各方面)领导权。更能表明葛兰西的独创性的政治思想的也正是狭义上的领导权概念。

葛兰西认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冑的领导权)。”(《狱中札记》第222页)在这里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比较独特的国家概念。他认为政治社会就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指一定阶级的强制性的政治统治,而市民社会则是指哪些私人领域。所谓国家概念中包含有属于市民社会的概念的某些成分,是指国家通过教会、工会、学校这样的一些机构,在市民社会行使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这样葛兰西所提出的国家概念就超出了原来专指政治社会的那种涵义,这种扩大了的国家概念就等于政治社会加上市民社会。国家通过政治社会进行强制性的压迫统治,它又通过市民社会行使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按照葛兰西的原话来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冑的领导权。”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葛兰西所使用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同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概念有所不同。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十八世纪产生的,“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马恩选集》第2卷第82页)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沿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它指的就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随着唯物史观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就用经济基础的科学概念取代了市民社会这个用语。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市民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国家在内的上层建筑。而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则包含有属于上层建筑、属于国家的成分。他明确指出:可以在两个层次上确定上层建筑,一个就是通常称为:“私人的”领域的市民社会,另一个就是政治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都把市民社会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因素,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马恩选集》第2卷第82页)他们注重对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的分析,把它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葛兰西注意的是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文化、精神、道德等方面的分析,把它看作有属于上层建筑的成分的概念,因此他才会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

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通过教会、工会、学校这样的组织,运用文化、宗教、教育等等作为媒介,对市民社会进行一种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指导,也就是行使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使人民群众接受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认同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换句话说,领导权就意味着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具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统治主导地位。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恩选集》第1卷第52页)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的进一步的发挥。他把国家看作是强制性的直接统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结合,并且十分强调领导权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活动的重要内容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领导者对那些被领导者实施领导权。

一个阶级不但要取得国家政权，而且还必须牢牢地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一旦统治阶级失去了这种领导权，那么国家就会处于危机状态。“一般都惯于说‘权威的危机’，而这也就是领导权的危机或整个国家的危机。”（《狱中札记》第158页）

葛兰西对国家的领导权的强调，是他对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进行严肃思考的结果。他并没有完全忽略国家统治的暴力基础，但是在他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中，更注意的是国家的另外一个重要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国家通过领导权取得人民群众对其统治的自发同意。他说：“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现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象强力依靠大多数的同意，……”（《狱中札记》第197—198页）人们一般认为，旧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既有刽子手的职能，又有牧师的职能，它是运用暴力和欺骗的文武两手来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的。不同在于，葛兰西所说的同意，并非是统治阶级有意地主观欺骗的结果。所谓有意的欺骗，那是统治阶级认为自己的统治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却又要故意美化自己的统治，以欺骗来取得人民对他们的统治的同意。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非是一种有意的欺骗，而是现实中的资产阶级确实具有自己的哲学世界观、文化价值观，把自己的利益看做是全社会的利益，而人民群众又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从而自发地同意现存的社会制度。葛兰西指出，唯心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错误在于，把意识形态仅仅看做是政治领导的工具，是统治者有意地骗人，而人民群众又受了骗。他认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一种历史现实，是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统治阶级只有在实施正常的领导权发生了困难，而实施强力又会有更大的危险性的情况下，才会有欺骗、舞弊这样的特有现象。“舞弊和欺骗处于同意与强力之间的中间地位，它们是一定情况下的特有现象。”（《狱中札记》第198页）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情况下，资产阶级并不是有意欺骗，而是通过领导权使人民自发地同意他们的统治，这一点构成了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葛兰西所领导的都灵工人运动只是获得了意大利其它地方的人民群众的很小的支持，相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却吸引了很多的工人和农民，这种反差无疑给葛兰西的思想带来很大的刺激。通过狱中艰难条件下的理论探索，他力图通过领导权的概念来解释令人困惑的上述历史现象。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深刻的独到的，这为我们分析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特征，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为什么今天西方的某些发达国家只有少量的军队却能保持政治的稳定？即使象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拥有的大量军队，也是主要用于对外争霸，而并非用于维持国内的政治统治。葛兰西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是依靠领导权，依靠人民的自发同意，而不仅仅是依靠政治强制，来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这一理论无疑有助于我们对现代西方国家的认识。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强调国家是政治压迫的暴力机器，甚至将其视作为是一种特殊的武装队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根据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得出来的结论。葛兰西则强调了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特征，这是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但是既然它更有利于说明现代西方国家的现实，那么就应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任何理论都不能当作僵化的教条去到处乱搬。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虽然能较好地说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征，却不能照搬到那些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南朝鲜、菲律宾、拉美各国，国

家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未稳固确立、国家的强制性特征仍然比较突出。其实葛兰西本身也注意到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区别，这是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问题。

二、革命和领导权

既然国家是政治社会加上市民社会，是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结合，那么在葛兰西看来，革命就不仅要武装夺取政权控制政治社会，同时还要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指导市民社会。夺取了国家政权机构，并不意味着同时就取得了领导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胜利。他认为革命并不是一个夺取政权的单纯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社会危机所造成的政治社会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文化条件的问题，一个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问题。

葛兰西还更进一步地指出，革命的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应当取得领导权，“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分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狱中札记》第317页）这样葛兰西也就是把取得领导权看做是革命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样也必须取得这种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关键在于，取得无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并不仅仅是在外部夺取旧的国家所控制的教会、工会、学校这样的组织机构，不仅仅是取得了各种的宣传媒介和工具，而是要真正地摧毁维护旧制度的种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确立起一种新秩序所要求的新的思想观念。换句话说，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是一场主观革命。通过主观革命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道德信仰和价值观念。在资产阶级领导权居于支配地位的市民社会，人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那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但是以某种思想体系支配着市民社会，而且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去了。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可能真正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是自发地同意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必须建立起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反文化，并且把新文化传播到市民社会中去，就是把新文化“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结构要素。”（《狱中札记》第8页）

早在1919—1920年，葛兰西在领导意大利的工厂委员会的运动的时候，他就认为不能把革命看做是把现存的国家政权夺取过来加以改造就可以了，而主张通过工厂委员会这种形式，去建立一种“新秩序”，使工人获得一种主体意识，获得一种为掌握国家政权所需要的责任意识，摆脱资产阶级工会所培养的狭隘的利己精神和劳动商品化的观念。他曾热心地倡议，在意大利各地建立“道德生活的俱乐部”，通过这种主观革命去形成新的社会所需要的新人。在《狱中札记》中，他早年的这种思想进一步演化为领导权的理论，并据此提出了东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著名观点。

葛兰西认为，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是运动战，以直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是阵地战，以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为目标。这种革命战略的不同，取决于东西方国家的政治结构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狱中札记》第180页）在葛兰西看来，东方社会的市民社会是不成熟的，国家的稳定主要是依靠国家政权本身来维持，国家政权本身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权本身就是一切，市民社会的因素相对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

东方的落后国家的革命中，国家政权本身就成为了无产阶级正面攻击的目标，夺取了国家政权就能有效地控制整个社会。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革命便可以采取运动战的方式，集中力量在刹那间打开统治集团的防御缺口，然后又迅速把力量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打开另一个缺口，最后强攻夺取政权。葛兰西认为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就是一种运动战的方式。

葛兰西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阵地战的革命战略的分析上。在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阶级不仅拥有国家的政治机器，而且牢固地掌握着市民社会的领导权。西方国家存在着成熟了的坚固的市民社会，它对维持西方国家的政治统治是起很大作用的，而国家的政治机器的作用相对地小。国家的政治机器只不过是一条外围的堑壕，在这条堑壕之后的市民社会则是一个工事和地堡的阵地，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所支配的这个市民社会阵地十分坚固，它能够承受各种经济、甚至是政治危机的打击，它是西方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基础。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就难以采取运动战的方式而取得胜利。这是因为：第一，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支配下，市民社会活动中的人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发同意国家的统治，所以难以用闪电般的速度组织起无产阶级的进攻力量。而统治者也不会马上士气低落、放弃自己的阵地的，因此企图以迅速的运动战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二，即使假设在某些条件下能够以迅速的运动战打开敌人营垒的缺口，夺取一部分的国家政权，但是在发达国家中国家政权自身只是一条外围的堑壕。堑壕背后是工事和地堡群构成的市民社会的阵地，夺取了国家政权不过是越过了一条前进的堑壕，资产阶级领导权所支配的市民社会阵地依然存在。这就还谈不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更主要的革命目标是市民社会，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是一种长久的阵地战，它实质上就是要粉碎旧的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所建立的领导权，从而逐步占领这个阵地，取得无产阶级在这个领域的领导权。

这种阵地战是一场争夺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战争”，是一场文化的攻坚战。葛兰西认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就已经进行了这种阵地战，对封建的意识形态采取了长期的攻势，然后才有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必须经历这样的阵地战，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才能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葛兰西的阵地战的观点，是同他的领导权的思想相一致的，就是要通过意识形态的革命、主观的革命，来取得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这个阵地的领导权。不管他的这一理论是否完全正确，但是它在西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一般都强调意识革命的重要性。他们普遍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不仅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且也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人被异化了，人的精神被扭曲了，甚至于人的心理都变形了。因此需要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马尔库塞的“意识革命”，赖希的“性—政治运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都具有明显的主观革命、精神革命，甚至于心理革命的倾向。

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注意到意识形态革命的问题。在中国，毛泽东也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曾经说过，他不要四个伟大，而只要当一个导师、一个教员就可以了。他惊叹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文艺等阵地已经为资产阶级所把持，甚至在党内也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于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的思想斗争，

样板戏的“高、大、全”的英雄榜样的宣传，并没有确立起新文化，倒是变成了一种假文化，甚至回复到了旧文化(封建文化)。“文化革命”成了一场动乱，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这些历史现象是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的。直到今天我们还认为观念变革是我们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这几年的传统文化热也表明了人们对观念变革的重视。问题在于应当建立起一种什么内容的新观念、新文化，应当如何去确立起这样新观念、新文化。葛兰西认为：“必须区别历史上固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一定基础所必需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合理化的，‘设想出来的’意识形态”。(《狱中札记》第64页)试图将一种随意的、主观设想出来的意识形态强加给社会是行不通的。即使把一种意识形态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只要它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就不能够真正确立起来。那样的主观革命就不可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三、知识分子与领导权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是同知识分子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葛兰西强调了国家的领导权，而在他看来，领导权的职能是由知识分子来承担的，是由知识分子来行使的，因而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戴维·麦克莱兰甚至认为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占据了中心的地位。

葛兰西认为，传统上总是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上来说明什么是知识分子，那是过分狭隘的。“在我看来，最通行的方法论的错误，就是企图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而不是相反，在各种关系体系的总和上寻找这种区别的标准，因为知识分子(以及从而他们所代表的集体)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一般总体之中。”(《狱中札记》第421页)工人的显著特点，并不在于他们从事的是手工劳动，而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从事那种劳动；同样地知识分子的特点也不在于他们是从事脑力劳动，关键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从事各种活动的。因而他们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与一定的社会阶级具有密切联系的。在葛兰西看来，每个阶级在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同时都会造就与自己具有同一性的各种知识分子。“所有社会集团，既产生于历来经济生产基础之上，也就同时有机地给自己造成一个或几个知识界阶层，这种阶层使知识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其自身作用的同一性和意识：企业主—资本家和自己一道创造出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学专家学者、新文化、新法律等等的组织者”。(《狱中札记》等418页)葛兰西认为，不存在知识分子的独立阶级，而是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是与一定的阶级具有密切联系的。为此他区分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所谓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与旧的生产方式、旧的阶级有联系的，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是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外的，是超越了社会的政治变革而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的。而有机的知识分子是同新的阶级具有密切联系的，每个新阶级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形成本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程度如何是看其同本阶级的联系程度如何。

葛兰西虽然强调知识分子与一定阶级具有密切联系，但是他并不把知识分子降低为专门为某个阶级服务的工具，降低为专为他人效劳的地位。相反，知识分子具有自己专门的指导、教育、组织的职能。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专门职能，因此他们才能成为上层建筑的活动家，成为国家的领导权的职能的承担者。“知识界与生产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决不是基本社会集团所具有的直接的相互关系；它们在各种程度上是全社会“中介”的结构，是

上层建筑的综合，知识分子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活动家’。……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狱中札记》第424—425页）知识分子作为国家领导权的行使者，他们的主要职能有两方面：其一，是行使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保证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同意统治集团的地位和威信，这就必须用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来教育指导人民。其二，是行使国家的强制性的政治管理的职能，进行直接统治，也就是当人民的“自由”同意动摇、领导权发生危机的时候，利用国家机器进行强制性的合法管理。知识分子既是某个阶级的意识的表达者、指导者，又是某个阶级的国家政权的组织者、管理者，具有领导国家的使命。因此葛兰西强调，一个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具有知识和技术的专家，而且应当是具有自觉的世界观的政治家，是专家+政治家，是具有政治头脑的统治集团“管家”。正因为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职能和使命，因此任何一个阶级要取得领导权，就得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是任何革命运动要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当葛兰西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国家的领导权的承担者时，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了。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还把政党看作是能同本阶级最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组织。“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狱中札记》第423页）政党是某些社会阶级直接在政治的领域内造就自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方法。这样，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就不是党领导知识分子，而是说党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如果说党是一个阶级的领导力量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该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是一种领导力量。这同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是领导权的承担者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因而，党同自己的阶级的关系，就是本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同本阶级的一般群众的关系，就是一种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这是一种有机的关系、辩证的关系，而不是一种领导者高高在上地发布命令，被领导者只是服从命令的僵化关系。作为工人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不应当把自己看作是无所不知的上帝，看作是雅各宾主义的政治精英，看作是制造科学世界观的仓库，而把群众只是看作是一种策略对象，看作被动地接受领导的芸芸众生。相反，作为本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是应当向群众灌输理论意识，给以指导，但是他们必须从群众的经验中吸收自己的养料，必须能够反映群众的真正愿望，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理论，并又去指导群众。正是基于对领导与被领导的这种有机的辩证的关系的认识，葛兰西坚决反对官僚集中制，强烈地主张民主集中制，将此视为衡量一个党、一个领导集团是进步还是退步的标准。

客观地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中，葛兰西是最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他充分地并且是富有独创性地讨论了知识分子在国家中、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知识分子看作是国家的领导权的承担者。长期以来，我们却把知识分子看做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教育对象，甚至将其视为臭老九，直至今天还存在着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并不是对立的，他们也不是工人阶级中的一般组成部分，而是工人阶级的意识的体现者、表达者、指导者。工人阶级是通过自己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来行使领导权，绝不能象文革期间那样，由工人、农民直接占领学校、国家机关等上层建筑领域，由他们取代知识分子作为上层建筑的活动家的地位。也许葛兰西过多地强调了知识分子与阶级的关系，但是他的那些看法不管是否完全正确，无疑会给我们新的启迪。

（作者系厦门大学政治学系教员）